

回首來時路：成年女性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之策略及其轉變因素

簡美華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摘要

對兒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而言，成長歷程中，若能採用多重策略，因應性侵害之影響，或許對成年期生活適應有益。但以往的研究，只著重在探討逃避因應策略，和心理病癥之關連性，甚難瞭解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之歷程。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深入瞭解兒時遭遇性侵害女性，因應性侵害影響之策略，和促使因應策略轉變之因素。本研究採「生命史」研究法，以立意選樣，選取五位成年女性進行深度訪談。所有訪談過程都予以錄音，並依口述資料，進行編碼後，形成二個重要類屬。受訪者慣用知命、運用閱讀治療、逃避人際親密、解離因應、或避免受虐情境重現之因應策略。且在成年早期，面臨必須正視兒時性創傷、工作生涯的抉擇、重新建構兒時性侵害經驗、諮商歷程產生權能激發時，都可能促使其因應策略轉變。依本研究發現和檢視相關實證研究，進行深入討論，且對於未來實務工作及研究方向，提供具體建議。

關鍵詞：女性、因應、兒童時期性侵害

壹、緒 論

因應 (coping) 是個體在面臨真實或預期的問題，和其伴隨的情緒時所採用的認知或行為改變，以期達到消除或減緩之效 (Aldwin, 1994; Batten, Follette, & Aban, 2001)。在人生歷程中，因應不是一個靜態的行為，而是反映在一個持續轉換的連續過程中 (Lazarus & Folkman, 1984)。對曾遭遇兒時性侵害 (childhood sexual abuse) 的成年女性而言，成長歷程中可能運用不同策略，因應性侵害之影響或生活困境 (Oaksford & Frude, 2003; Sigmon, Greene, Rohan, & Nichols, 1996)。若能採用多重因應策略面對生活困境，或許對成年期生活適應有益 (Jones, 1997)。但以往有關兒童時期性侵害之研究，往往只著重心理病癥之診斷，或從創傷經驗中所獲得之正向力量，實應對其因應策略之變化過程和影響因素加以探究。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深入瞭解女性因應兒時性侵害之經驗，以及影響因應方式轉變之因素。提出二個研究問題：(1) 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的主要策略為何？(2) 在成長歷程中，因應策略是否有些變化？

兒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在成長歷程中，極易成為心理疾病或生活適應困難的高危險群 (Johnson, Sheahan, & Chard, 2003; MacMillan et al., 2001; Oddone-Paolucci, Genuis, & Violato, 2001; Thompson et al., 2003; Turell & Armsworth, 2003)。但當前的實證研究，仍無法推論兒時性侵害導致成人期心理疾病 (Sigmon et al., 1996)，及具體說明因應兒時性創傷之變化歷程 (Feiring, Taska, & Lewis, 1996)。其實，當事人也可能從因應兒時創傷歷程中獲取正向意義，如習得自我保護、保護自己的下一代、提升自我價值感、生活結構改善、找尋生命的意義、對他人更能同理或改善人際關係 (McMillen, 1999; Oaksford & Frude, 2003; Russell, 1986)。

近年來，台灣已陸續出版一些與兒童時期性侵害相關之文獻 (如：李開敏，2003；吳麗琴，2003；洪素珍、王玥好，2004；范幸玲，2004；陳若璋，2000，2005；葉貞屏，2002；廖秀敏，2002；簡美華、管貴貞，2006；Chien, 2005；Wang,

2004)。一方面，顯示國內已開始重視復原力在因應兒時性侵害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仍需更多實證研究深入瞭解兒時性侵害對當事人的長期影響，以提供更多有效處遇方案。

社會大眾在得知性侵害事件時，傾向以否認或貶低問題嚴重性的方式處理 (Fleming & Belanger, 2001)。例如，九十五年度性侵害通報人數，性侵害受害年齡層在 12 歲以下的人數，明顯比其他年齡層低 (內政部警政署，2007)。在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女性貞節觀、家族顏面和人際和諧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因應兒時性侵害的歷程，可能影響女性之自我價值感或生活適應，甚至限制尋求心理衛生專業協助之意願 (Chien, 2005)。以九十五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之保護扶助統計為例，即使女性受害比例遠高於男性，在兩性保護扶助中，接受和提供的心理輔導服務卻僅佔 7.99%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無日期)。因此，在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下，兒時遭遇性侵害女性之回應是否如西方研究結果一樣 (如，Merrill, Thomsen, Sinclair, Gold, & Milner, 2001; Rosenthal, Hall, Palm, Batten, & Follette, 2005; Steel, Sanna, Hammond, Whipple, & Cross, 2004)，傾向以逃避策略因應，值得心理衛生專業重視。

一、兒時性侵害和因應

學者常將因應策略，區分為二大類型，包括：(1)問題解決或尋求相關資訊方式 (開始因應)；(2)否認或退縮 (避免策略) (Holahan & Moos, 1994)。當前的研究 (如，Futa, Nash, Hansen, & Garbin, 2003; Steel et al., 2004)，多採 Lazarus 與 Folkman 的三個分量表，含情緒策略量表、問題解決策略、混合情緒和問題解決策略 (社會支持) 來測量因應。但此量表僅測量因應之類型，甚難瞭解個體因應策略之變化為何。從適應觀點來看，因應是個體在壓力中，找尋意義的過程 (Pargament, 1997)。所以，探討適應兒時性侵害之後果上，應著重在當事人面對兒時性侵害影響時，找尋因應意義的歷程。

也由於評估成功因應的指標不一，對有效因應 (或成功因應) 的界定也未

見定論。Monat 和 Lazarus 認為測量成功的因應，必須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個不同層次來評估，不是僅以立即成果而定（引自 Frieze & Bookwala, 1996）。事實上，所有的因應策略都有正負向效果，即使是逃避策略，當事人可能因情境因素、認知能力，而視逃避為成功因應（Frieze & Bookwala, 1996）。因而，如同 Houston 所主張，在界定有效因應與否時，必須考量因應行為本身、他人的接受度、短期和長期的效果三者（引自 Frieze & Bookwala, 1996）。

運用「成果模式」（outcome approach）或「過程模式」（process model）（Pargament, 1997），皆可探討兒時遭遇性侵害者之因應策略，但必須瞭解在特定壓力情境下所採用之因應策略，方能評估其有效性。以過程模式評估因應，需要考量因應方法、因應的終極目的、個人和社會體系之間的適配性三者。顯然，採過程模式探討兒時遭遇性侵害者的成功因應，似乎比結果評估適切。因為台灣社會仍強調家族顏面、人際和諧與女性貞節觀，在壓力下，當事人之因應策略是呈現衡量情境脈絡後之反應。在台灣社會中，運用逃避型策略不必然是負向的，尤其是兒童在因應性侵害所帶來的痛苦上，它可能是人際或壓力之緩衝劑（Chien, 2005）。

同樣地，即使成人期採逃避因應策略，也不必然造成人際困擾或適應困難，有時也可減緩親職間衝突和減少人際間尷尬（Tjosvold & Sun, 2002）。因此，探討因應策略時，應考量當事人運用策略之彈性及因應資源多寡。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對因應策略的使用與詮釋因應效能上，或許有其意義。

二、因應兒時性侵害與成年時期適應

是否遭遇兒時性侵害者所採用的因應策略，會影響成人期心理社會適應，目前的研究結果不一（如，Merrill et al., 2001; Rosenthal et al., 2005; Runtz & Schallow, 1997; Shapiro & Levendosky, 1999; Tremblay, Hebert, & Piche, 1999）。就逃避型、情緒為主、接納、問題導向四種策略來看，逃避型和情緒策略可能預測成人期心理適應（Sigmon, 1996）。運用情緒因應策略者，最常使用分離和

願望式思考，甚至愈常在兒時採情緒因應策略者，在成人時期出現心理困擾愈多 (Long & Jackson, 1993)。似乎兒時遭遇性侵害的類型、時間長短、或嚴重程度，對女性成人期的自我價值或精神疾病之罹患率無明顯影響 (Futa et al., 2003; Perrott, Morris, Martin, & Romans, 1998)；而採用刻意壓抑者，易呈現低自我價值 (Perrott et al., 1998)。但無法區辨足以影響當事人因應模式之事件、情境或因應資源。

目前在探討因應策略上多以回溯性方式，甚少比較成年期與兒時因應方式之異同。不少研究係以高功能大學女性為對象，發現遭遇兒時性侵害之大學女性運用逃避因應的比例，似乎比一般大學生高 (Batten et al., 2001)。研究顯示，大學女性運用逃避方式因應兒時性侵害，與成年期心理健康相關 (Batten et al., 2001; Rosenthal et al., 2005)。唯一可以預測大學女性在成人期再度遭遇性侵害之因素，是當事人採用不當因應策略，如：人際退縮、性行為、藥酒濫用等因應；愈自責者愈傾向採用不當因應策略 (Filipas & Ullman, 2006)。

兒時遭遇性侵害的成年女性常使用的因應策略，包括：壓抑、重新建構對性侵害的看法、疏通性創傷經驗、尋求協助、成人期述說性創傷經驗，和靠自己因應 (Perrott et al., 1998)。高功能的成年女性或大學女性似乎傾向採正向認知因應，如：擁有夢想、自我探索、重訪過去兒時經驗等因應策略 (DiPalma, 1994)，也可能運用揭露和討論兒時性侵害、將傷害縮小化、正向地重新建構兒時性侵害、拒絕挖掘兒時性創傷 (Himelein & McElrath, 1996)。

在兒童時期，或許逃避型策略能協助兒童因應性侵害所帶來的痛苦，但若援用至成人期，可能造成人際困擾或適應問題 (Steel et al., 2004)。也許，人格疾患和創傷後壓力疾患就是逃避因應之結果 (Johnson et al., 2003; Morrow & Smith, 1995)。兒時遭遇性侵害且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疾患的女性中，有較高比例採用逃避策略和診斷為依賴型人格疾患 (Johnson et al., 2003)。但限於臨床研究的抽樣限制，可否推論至社區樣本仍有待商榷。

或許兒時遭遇性侵害的成年女性在與性侵害相關之壓力下，愈採用阻隔 (disengagement) 策略 (如：花更多時間獨處、避免想起與性侵害有關的事)

(Coffey, Leitenberg, Henning, Turner, & Bennett, 1996; Morrow & Smith, 1995)。但傾向運用參與 (engagement) 策略於與兒時性侵害無關之處，且易產生更多困擾 (Coffey et al., 1996)。即使兒時遭遇性侵害者傾向以逃避策略因應兒時性創傷所帶來的淹沒感，但目前研究並未檢證逃避策略的運用，是否會因時因地制宜 (Steel et al., 2004)，而造成因應策略轉變之因素。

三、兒童時期與成人期的因應策略

目前僅有 Oaksford 與 Frude (2003)、Sigmon 等人 (1996) 檢證了兒時遭遇性侵害者在兒童時期與成人期的因應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在性侵害發生的初期，受害兒童採用的因應策略，包括：心理上的逃脫、尋求支持、行動取向、認知評價 (Oaksford & Frude, 2003)，且多數傾向採心理逃脫因應 (Oaksford & Frude, 2003; Sigmon et al., 1996)。

在長期因應上，兒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傾向採心理逃脫、尋求支持、行動取向、認知評價、正向重新建構、自我保護等因應策略 (Oaksford & Frude, 2003)。成年女性大多運用多種因應策略，但兩性在採問題解決和逃避因應上沒有顯著差異，主要差異在於女性以「情緒」為主要的策略因應，但男性傾向採「接納」策略接受性侵害發生的事實已無法改變 (Sigmon et al., 1996)。造成兩性差異的原因，或許是研究中男性年齡層偏高 (Sigmon et al., 1996)，以及社會化歷程中對兩性之性別期望不同所致。也因兩性情感表達易有差異，在兒時性侵害的因應上或許也有差異。因此，以女性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可深入探討除了逃避因應外，對情緒因應之變化歷程。

在長期因應上，幾乎所有受害當事人都會採用正向重新建構，且最常運用的策略是認知評價 (Oaksford & Frude, 2003)。在所有的認知評價策略當中，只有心理控制和縮小化性侵害傷害是長期因應才採用的，以心理控制面對兒時性侵害是指自己已覺得變強壯，不會再度遭遇性侵害和兒時之施虐者無法再傷害之，顯示了長期因應和短期因應策略之區別 (Oaksford & Frude, 2003)。也說明

了，青少年和成人早期傾向採用負向因應策略（正向因應指以問題解決為主，負向因應策略是以情緒取向為主），這樣的差異可能是能夠運用的因應策略有限所致（Whiffen & MacIntosh, 2005）。同一因應策略在不同年齡階段，可能因情境或因應目的之差異，而彰顯不同意義及效益。

綜合言之，兒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在兒時所使用的因應策略，與成人時期可能有所不同，但影響因應策略轉變之因素仍待探究。且在與兒時性侵害相關的壓力情境下，當事人經常採用的因應策略，也需進一步探討。

貳、研究方法

遭遇兒時性侵害女性在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時，可能與其生命發展歷程息息相關，適合採「生命史」(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Talyor & Bogdan, 1998) 的質性研究法。生命史可引導研究者瞭解、詮釋兒時遭遇性侵害女性之因應策略，和影響其因應轉變之因素。

生命史所涉及的敘事內涵猶如個人自傳，藉由不斷回溯過往生命經驗，研究者與受訪者能相互瞭解社會文化脈絡對於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之影響 (Tierney, 2000)。生命史的述說可以從不同觀點或不同取向加以呈現，而本研究選定因應兒時性侵害為主軸，深入探究因應之意義，並以訪談歷程做為協助研究者與受訪者對於因應方式，能取得相互瞭解之憑藉。據此，生命史不但呈現因應兒時性侵害的記憶，且受訪者從中也創造個人認定感 (Runyan, 1982; Tierney, 2000)。

一、訪談對象之界定與篩選

訪談對象必須涵括以下條件：(1)兒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現年 25-40 歲；(2)第一次性侵害的施虐者是熟識男性長輩：生（繼或養）父、家庭的親近朋友、照顧者、親戚、非施虐母親的（同居）男友等；(3)性侵害定義為 13 歲以前（國

中) 遭遇至少一次性接觸(包括從撫弄性器官至性交), 且包含被強迫暴露、觀看性器官、或賣淫。此外, 主旨在探討自幼對性創傷之因應, 故排除一直到成年(18歲之後)才回憶(或瞭解)兒時性侵害者。

將邀請訪談海報張貼於社會福利、心理衛生機構和自助團體之公告欄, 以「立意選樣法」選取受訪者。為確保受訪者基於自由意願參與訪談, 有興趣者必須親自聯絡研究者。研究者在初次電話接觸中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訪談方式、訪談錄音、訪談同意書和回答相關疑問。研究進行期間, 共有 12 位女性來電詢問, 有 5 位符合受訪資格, 並完成訪談。

二、資料收集

測量工具採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運用「深度訪談法」(Ely, 1991), 由研究者本人進行訪談工作。在正式訪談前, 邀請一位心理衛生同僚檢視訪談大綱(包括兒時性侵害經驗和性侵害經驗之影響與因應)。每位受訪者訪談次數平均為 3 次, 每次約 120 分鐘, 但訪談時間與地點, 都依個別情況而定。完成至少二次訪談後, 即贈予受訪者一千元禮券, 以答謝所付出之時間與心力。

三、資料分析

生命史的述說結構, 可以不同的觀點、或不同的取向。依據本研究之目的, 選定因應兒時性侵害為述說主題, 以探究其因應之意義。訪談資料之分析係根據研究目的, 著重於敘述受訪者因應性侵害之歷程, 且對因應策略給予連貫一致的描述。不必遵循受訪者的生命發展階段、或因應的因果循環模式加以闡釋 (Runyan, 1982)。

資料之分析始於閱讀逐字稿, 以辨識受訪者經歷之重要事件及因應經驗 (Talyor & Bogdan, 1998)。採「逐行逐句分析」(A line-by-line approach) (Ely, 1991), 由研究者閱讀每一個句子, 探詢其代表之意義, 且同時在逐字稿空白處記下代表的涵意和編碼, 再檢視各編碼間的關聯性, 形成重要主題及類屬

(Leininger, 1994; van Manen, 1990)。因此，重要主題的形成來自受訪者一再出現的字句 (Ely, 1991; Leitninger, 1994) 及具有強烈意義或行為意涵的特定編碼 (Ely, 1991)。

撰寫研究發現時，研究者在引用訪談資料，以不刪除受訪者之贅詞或修飾其文辭為原則，以保留受訪者言語之脈絡 (Talyor & Bogdan, 1998)。此外，經由檢視所有訪問稿及訪談日誌 (Patton, 2002)，並由一位心理衛生專業人員閱讀部分訪問稿 (audit trails) 協助檢視訪問稿編碼，和增進訪談資料的可信度 (Padgett, 1998)。

四、研究倫理

確保恪遵研究倫理之方式，於訪談邀請函中詳載研究目的、訪談方式和錄音、參與研究同意書、受訪者有權隨時停止 (或中止) 訪談等。所有潛在受訪者皆主動與研究者聯繫，且基於自由意願下參與。於訪談期間，若因訪談而感受任何情緒反應，研究者立即與其討論可運用的心理諮商資源。

每個人對生命經驗之建構是經由不斷重塑和修正自身觀點而得，且受訪者是自己生命經驗的主角，擁有持續重塑或修正自身觀點的權利。因此，訪談中若出現前後觀點不一致現象皆視為正常，且代表了受訪者的因應歷程 (Taylor & Bodgan, 1998; Holstein & Gubrium, 1995)。此外，給予受訪者一份完整訪談逐字稿，提供其檢視訪談內容、可要求刪除訪談 (部分) 內容、破壞訪談錄音帶或退出訪談之機會。

參、研究發現

以晶晶、曦曦、琳琳、慧慧、婷婷五個假名稱呼受訪者，且基本資料的呈現上，僅列出與研究相關的資料類別，以保障匿名性及隱私權。五位女性的年齡介於 25-40 歲之間，其中 3 位是 25-30 歲。學歷方面，1 位是高中職，其餘為

大專以上。婚姻狀態方面，有 1 位已婚、1 位離婚、3 位未婚。工作狀況方面，1 位處於轉業中，1 位是學生，其他 3 位有穩定工作。

性侵害類型方面，5 位皆遭遇近親猥褻，其中 2 位遭遇性器官插入。且有 2 位在國中階段，仍遭遇不同施虐者性侵害。首次施虐者，涵括生父、叔父、舅舅和熟識的長輩等。5 位受訪者的施虐者，都包括生父（以猥褻為主，但遭遇性侵害的年齡不一）在內。

以下是受訪者目前因應狀態的側寫，也反映對成功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之敘述，茲引用如下：

（一）琳琳

我只是目前覺得，好像我現在這樣也 OK 啊！搞不好這樣就是就差不多也不一定，搞不好有時候談到某一個議題，覺得會想要再去討論，那就再下去這樣子。目前覺得好像還沒有那一個點，讓我覺得還可以再深入，小到很小可能就是講的時候，不會哭了吧（琳 II: 2345-2353）。

（二）慧慧

真正我覺得走過來的時候，是它其實還是會有浪來，可是我知道這個浪來的時候，我要怎麼樣跳起來就好了，我不會因為這個浪來，然後我就被淹沒了這樣子，或者是說那個浪其實愈來愈小，或者當一個浪來的時候，我其實是可以把這個浪變成一個力量，可能是在瞭解那個推浪的人他是一個什麼樣人，或者是說，這樣的一個力量，可以變成我在做創作的時候的一個動力這樣子（慧 II: 2596-2663）。

（三）曦曦

我只能夠說我現在已經站在可以看得到康莊大道的位置跟角度了，以前是連這個康莊大道都沒有，妳可能在一個黑漆漆的房子裡面……ending 就是可以有這個事件、也接受了這個事件、也可以再回去看這個事件。那至於回去看這個事件會不會再落淚，並不代表回去看這個事件還會再落淚就是沒有走

完，只不過是當下再疼惜她（內在小孩）一次而已。我覺得那如果既然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我應該現在就已經算是差不多啦（曦 III: 5765-5770）！

（四）晶晶

如果以復原是十分，然後自己跑掉是零分的話，我現在此刻我可能在八分左右，然後有時候會回到二、三分。我是覺得來來回回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走到十分？十分的狀態就是很穩定、很澄澈、心裡很平靜，我隨時可以知覺到現實，我也可以隨時做出判斷跟選擇（晶 II: 1687-1696）。

（五）婷婷

因為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好好處理，就是說當有一些事情被揭發、揭露出來，可是又沒有包紮好，那乾脆不要開好了、不要看好了！我不覺得有人可以做這樣的事，有人可以花這樣的功夫、有這樣的能力做這樣的事，所以我就想說：「算了，反正我一個人不是還是活到現在」，大不了有一天就不見了（婷 III: 4146-4151）。

類屬一、慣用之因應策略

五位受訪者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的策略，包括知命、運用閱讀治療、逃避人際親密、解離因應或避免受虐情境重現。此外，每位受訪者因應方式並非一成不變。

主題一、知命

曦曦是受訪者中，對目前生活情境持最正向信念者，也在言談之間流露著對自我的激賞與肯定。曦曦說：

我會用「世界蟑螂」來形容我自己。可是明明那個蟑螂，對蟑螂的定義就是骯髒、唾棄、人人喊打。可是我講到蟑螂就是它的生命力，它可以這麼不死，它可以這麼生命力、這麼強繁殖力這麼快，可以這麼的有方法（曦 III: 5395-5397）。

年幼時，曦曦即因為家庭環境因素，習於採行動取向之生存策略。因而，在面對兒時性侵害之影響，曦曦依然採此策略因應：「我是什麼事情，從小到大都得要自己來，什麼都要自己動頭腦、自己想辦法，像沒錢也要自己想辦法」（曦I: 683-684）。

訪談中，慧慧用非常平穩的語氣描述因應兒時性侵害的歷程，且在生活壓力與各種生活難題中，早已學會運用一己之力以達問題解決之效。慧慧說：

它其實跟我在生活上遇到的其他事情一樣，可以是小事一椿，也可以一樣是
大事一椿……它其實是一樣的嘛，所有事情妳都要去面對，然後妳就是要想
辦法，把它處理到一個妳覺得 ok 的位置（慧 II: 2246-2256）。

主題二、運用閱讀治療

隨著現代教育和知識傳播的普及，多數受訪者從大眾傳播媒介獲取資訊和資源，如書籍的閱讀。在成年早期，琳琳曾運用資訊流通之隱密性，如參與各類型團體以探索兒時性侵害經驗之影響，也隨時留意與性議題相關的訊息。在大眾心理學書籍推波助瀾之下，晶晶對因應有新體會：

好像過去也聽到，好像蠻多跟我在一起的女孩子有提到說，她們也有類似，
就是覺得突然之間自己跟自己不在一起（晶 II: 1858-1859）。

在成年早期，曦曦和慧慧也從自助心理學書籍中找尋因應兒時性侵害之方法，從中獲得認知理解和對自身經驗之詮釋，但也產生一些困惑。例如，曦曦一度以為面質施虐者是踏上復原必經之路，而想藉由出版自傳達到面質目的。曦曦說：

那本書（錯不在你）真的是最後一定要做面質的動作，自己記述受傷害的那些人，她們一致到最後的目標都是面質。所以，這會讓我誤判、或者是誤以為真的要走到面質，才叫做結束（曦 II: 1951-1954）。

在成年早期，慧慧也覺得自助心理學書籍描述揭露性侵害部分，是兒時遭遇性侵害者之必經歷程。慧慧提到：「或許跟我爸媽說，是在解決這件事情上一條必經的道路」（慧II: 1548-1549）。然而，事與願違，在家人無法面對揭露性侵害的壓力，有一段時日慧慧斷絕與原生家庭連結。在慧慧的認知中，閱讀自助心理學書籍的同時，也為自己兒時性侵害經驗貼上負面標籤，以為人生已無希望。慧慧此刻對自助心理學書籍之看法：

好像就是站在一個老師的角度，其實它根本沒有很關心說妳這個人，妳要怎麼樣去面對妳的生命，我覺得那件事情它根本不關心，它只有好像要研究這個問題，然後就把這個事情的影響無限的擴大之類的（慧 II: 2580-2583）。

當慧慧發現兒時性侵害傷害甚鉅，因而尋求心理諮商或輔導資源的同時，卻感受更多傷害：

妳這輩子就不可能跟別人有一樣的生活了，或者是說，那個就是妳心口可能永遠的痛，或者是說，妳就是永遠不可能回到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常態去了。我覺得當我在看那些書的時候，它們給我的感覺是這樣（慧 II: 2215-2218）。

似乎書籍能提供的內容，並不代表所有遭遇兒時性侵害者必然的經歷與因應結果。因此，在閱讀兒時性侵害相關資訊中，如何能汲取正向意涵和找到與自己生命經驗共鳴之處，對受訪者而言的確不容易。

主題三、逃避人際親密

（一）人際信任度低

多數受訪者表示兒時性侵害經驗破壞其人際界限和信任感，導致其成長歷程中甚難與人親密。慧慧在青少年期自覺因兒時性侵害喪失貞操，無法和其他女性一樣，決定拋開傳統女性角色：「那個不一樣，其實就包含很多的自主跟堅強。那自主跟堅強，其實就是不能顯現自己的脆弱」（慧 II: 1929-1930）。直至成年早期，慧慧赫然發現：「原來我的孤僻，原來我跟人家不一樣，原來什麼通通都是這個的原因這樣」（慧 II: 1764-1765）。

晶晶和婷婷也察覺兒時性侵害經驗影響其人際親密，導致成長過程中人際適應困難。晶晶表示：

因為就是在跟別人互動久了，那個自己就會慢慢的消失，那愈消失就是自己死的，就是死掉的部分越多，需要再回去把自己再給召喚出來（晶 II: 2565-2567）。

婷婷同樣感慨自幼缺乏朋友，尤其是同性朋友。自成年早期以來，男友是唯一親近之人，二人世界早已是生活的全部，更難擴展社會網絡。婷婷說：

我知道我不跟人家在一起比較舒服、比較有安全感。跟人家在一起的時候，我就很 defense，我必須要花很多注意力在 coping 這些事，然後在注意我的環境、或者我自己的回應（婷 I: 693-695）。

（二）逃避親密關係

兒時遭遇性侵害也可能使受訪者對親密關係採取否認或忽視因應，以減低人際中界限涉入，甚至難與人親密。晶晶述及其避免任何與異性親密之機會，且堅守聖潔、白雪公主般形象：

我就是不要碰男人、不要碰感情、不要想到性，連那種字眼或畫面，或者是 A 片也沒看過，第一次是看已經是成年早期，才一次看到 A 片，後來聽到也是迴避，那跟我是絕緣的（晶 III: 3212-3215）。

青少年期至今，曦曦始終在人際中採取自我保護方式，甚至以欺壓異性的方式，預防受傷。曦曦說：

我甚至為什麼一直強化我是女王峰（電影片名），就是因為我每強化一遍我是女王峰，坦白說，在我腦海裡就已經 run 過一遍，因為小時候我遭受過這些事情，所以，我有資格做女王峰，所以有資格去殘害那些人（男友）（曦 II: 1638-1641）。

主題四、解離因應

兒時遭遇性侵害者可能運用解離方式因應性創傷，企圖減少負向效應。如曦曦和晶晶以解離方式暫時隔絕痛苦感受。曦曦描述童年性侵害的一些場景：

小時候被性侵害的時候，那時候我是屬於比較沒有感覺的，例如看著天花板、或者是閉著眼睛想為什麼不快點過？為什麼不快點結束？就這樣而已啊……我自己真的就是空的，可是我在上面是看到，可是我這個人是沒有感覺，因為她跟我是脫離的肉體，她只有靈魂，所以靈魂是沒有感覺的，那我也一樣沒有感覺，因為我靈魂飛了（曦 III: 3727-3730）。

對晶晶而言，解離也產生保護自我的功能。晶晶描述遭遇兒時性侵害當下，解離隔絕痛苦之效：

命令自己的腦袋趕快睡著，然後就真的睡著了，是瞬間就已經辦到的事情，可以瞬間辦到沒有感覺，然後忘記了，那件事情不在，妳不屬於我這個人的一部份，可以瞬間把它切掉（晶 III: 3759-3762）。

但成長過程中，也可能因此慣用解離阻絕感受。就如曦曦所言，隔絕感受，早已是生存策略，如今得仰賴外力，方可解除：

自己一個人靜下來，然後有心想要去想那個部分，我進不去。就跟我的諮商師形容是我就是沒有門啊，沒有門可以進去啊（曦 II: 1507-1509）。

此外，晶晶也分享另一個我（「綠綠」），為現實生活中低自我價值產生抗壓作用。因而，晶晶希望「綠綠」能在遭逢危機時，助其一臂之力：

綠綠就是我，綠綠才是真正的我，這個我是面具，是面對成長過程中發展出來的面具，我想要掌握得住那個自己身體裡面那個真正的綠綠、真正的自己（晶 III: 3157-3159）。

雖然解離有其功能性，卻也反映晶晶需要協助，以因應外在環境的壓力。

晶晶說：

當她在的時候，她是我的那個一個判斷事情的一個可以做抉擇的能力，因為她不在的時候，我幾乎判斷能力是喪失的（晶 I: 722-724）。

主題五、避免受虐情境重現

自幼，婷婷就以重演受虐情境方式，使自己心安和去人化。每晚，婷婷必須耗盡精神方能安然入睡。且所想像或上演的場景，皆充滿受害者、施虐者和拯救者三者的故事：

在我小學後半段，我演的都是一些很悲慘的故事，就像電視裡面演的啊，女主角被欺負什麼的，然後甚至最後死掉都有啊，或者是被打啊、被凌虐啊。可是，有時候會遇到好人把她救起來，很少後來就很少，後來我覺得那個女生一定要被欺負，然後可能要遇到一個好人，她才會被救起來類似這樣子（婷 II: 2213-2227）。

當生活事件引發受虐經驗重現時，晶晶和婷婷都傾向採取忽視。例如，婷婷說：「我知道那不會再發生了，因為我根本不會靠近娃娃車」（婷 III: 4046-4047）。但對晶晶和婷婷而言，面對施虐者病亡過程，即使選擇忽視仍難減輕觸發受虐經驗之煎熬。婷婷描述為父親包紮傷口或協助如廁時，內心之掙扎：「真的是又愛又恨，像我爸爸，他在我心目中小時候那個強壯，可是又恐怖的巨大的身影」（婷 I: 357-358）。

同樣地，在父親生病和臨終前，晶晶倍感為人子女盡孝道照顧的壓力。晶晶說：「但是面對，我只侷限到去碰他的眼睛，我幫他把眼睛這邊的有一些那個眼屎給擦掉，我覺得那就已經是我的極限」（晶 III: 3828-3829）。隨著父親過世，晶晶頓然如釋重負。

類屬二、影響因應策略轉換之因素

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的歷程及因應策略並非一成不變。尤其是成人早期，種種生活事件或議題都蘊含催化受訪者正視兒時性創傷之機會，及轉變因應方式。

主題一、正視兒時性創傷

成長歷程中，有些因素易喚起兒時性侵害經驗及沈積已久的感受，使其正視兒時性創傷，如：親密關係、親子界限和生活事件等。

次主題一、親密議題

發展親密關係是成人階段的重要議題，也是迫使受訪者面對或處理兒時性侵害的重要關鍵。在成長過程中，即使琳琳和慧慧曾以各種方式因應兒時性侵害之傷害，卻始終保守秘密。直至成年早期遭遇親密問題時，才願意真正面對兒時性侵害問題。

琳琳和慧慧皆受傳統貞操觀念影響，一直擔心兒時性侵害經驗會影響親密關係、婚姻狀況。二人都認為，只要向男友揭露兒時性侵害經驗，應可獲得瞭解和接納，進而使親密關係順利。琳琳說：

我覺得對我來講，那時候最大的挑戰，就是我要跟我的男朋友講這件事……
我覺得我比較好一點的是，跟我男朋友講了之後，然後他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排斥，我就覺得其實就好一大半了（琳 I: 49-51）。

對慧慧而言，成年早期經歷親密關係破裂，才是導致向家人揭露性創傷，和後來與家人斷絕往來的關鍵。慧慧描述從僅擔心未來伴侶排拒、堅持必須在與異性交往前揭露性創傷，到被迫深入探索兒時性創傷之心理歷程：

其實是，一直到就是跟那個已婚的男朋友交往的時候（成年早期），我才會開始去想到說，說不定這件事情的影響，不是只有我想的那麼簡單，還有影響到我其他的性格，才開始做比較多的檢討之類的（慧 II: 1435-1439）。

次主題二、親子教養界限模糊

成年階段的另一重要任務是母職功能的發展。對多數人而言，母職角色是一大挑戰，兒時遭遇性侵害的女性也可能面對為人母的人際議題。一次親子教養事件，促使曦曦面對長久以來的情緒失控問題，和深入探索兒時性創傷。曦曦說：

有小女孩在浴室裡面洗澡，跟她媽媽在浴室洗澡，然後我兒子就探頭看她們，其實是鬧嘛，我們是知道那麼小的小朋友，那時候是鬧的行為嘛，可是卻被我抓來痛打一頓，我說：你要變態狂啊！你要變什麼，我就講一堆那種字眼色魔啊什麼，然後就把他痛打一頓（曦 I: 94-98）。

次主題三、生活事件喚起兒時性侵害經驗

長期以來，晶晶和婷婷都以忽視策略因應兒時性侵害記憶重現，但對某些生活事件，忽視不一定是有效的因應。晶晶談到，成年早期首度無法阻擋兒時性侵害情境重現：

我有一次突然在看一本書的時候，是一個女孩子她也是經歷類似的事情，從她父親走進客廳的沙發，從臉部的撫摸開始……提起以後的隔一天，就有如那個火山爆發，那個海浪排山倒海一樣，所有的情緒都完全都出來（晶 I: 53-68）。

因而，晶晶慣用的逃避策略已無法因應，必須立即處理兒時性創傷。晶晶說：「那次痛到根本睡不著，躺在床上也不能動。那時候我死也不願意再去命令它不准痛了」（晶 III: 3779-3780）。

婷婷也傾向以逃避方式因應兒時性侵害記憶之喚起，及兒時性侵害的負向

影響。婷婷說：

老先生，有時候還是會，如果也是高高瘦瘦的，我就會嚇到，但是看到娃娃車，我是一定會想起來，因為以前不是常常有什麼娃娃車火燒，我都會想起來（婷 III: 4038-4040）。

婷婷發現生活事件的衝擊愈大，喚起兒時性侵害經驗的負面效應也愈大，迫使自己得正視兒時性侵害之傷害。就像婷婷參與研究訪談的動機：

我自己的一些現在的生活，也會遇到一些類似他的老人，因為我必須要去面對，可是我覺得很可怕，變成我在處理，就是我會有很多的防備，然後我覺得漸漸影響到很多我跟人的關係（婷 I: 38-41）。

主題二、工作或生涯轉變

成年早期面臨相當多挑戰，尤其是生涯的選擇或親密關係的建立和維持。也凸顯受訪者此階段所面臨的壓力，甚至必須重新調整或轉變因應方式。慧慧從工作經驗中獲取自我實現感，且瞭解欲追求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是我有機會去磨練自己的能力，然後也實現自己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我看到很多人，他們是這樣子在過生活的。就是追求另外一種價值，就是不是一般世俗的那種名利、錢、安定而已（慧 I: 395-398）。

婷婷分享生涯發展的轉變及其信念，婷婷提及：「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為什麼為了過去、還有我家裡帶給我的不愉快，放棄掉我的未來，不需要啊」（婷 I: 545-546）。婷婷表示，爲了彌補童年未感受完整家庭的遺憾，其立志成爲有能力的專業人士。婷婷描述找回童年記憶的方法：

我覺得我必須要去面對這些事情，我就去老家，很幸運的那些房子還在，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住的地方，很幸運的裡面有人住，還讓我進去開每一扇窗戶（婷 I: 1174-1177）。

如何理解發生性侵害的本質，與社會文化脈絡對家族觀念、人際和諧、女性貞操等影響，左右了受訪者在成長歷程中詮釋兒時性侵害的傷害和責任。因此，在成年早期，這些覺知和詮釋影響受訪者因應方式之轉變。琳琳認為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的過程，真實回映在對心理衛生工作的態度上。琳琳說：

我想要去調適說，有時候專業人員，就是沒有就是無力去改變現狀，沒有辦法去加速孩子走到比較正向的，我覺得我自己也花了那麼多時間走過來，所以，我相信時間也是需要的（琳 I: 855-857）。

主題三、重新建構因應兒時性侵害的意義

成年早期，不少受訪者積極為兒時性侵害經驗賦予意義。琳琳一直仰賴自身之力理解兒時性侵害對親密關係之影響。但在心理衛生工作中，深切體會社會文化脈絡型塑人際界限、家庭關係、家族顏面、性禁忌後對個人之影響力。當受害兒童面臨揭露性創傷和必須面對家人質疑或否認時，琳琳自身的因應經驗，除了提醒專業工作上必須尊重與同理受害兒童的需求，也同時衝擊自己慣用的因應策略。琳琳回溯在成年早期猶豫是否向母親揭露性侵害，以及專業工作之挑戰下，不斷迫使自己重新檢視自身因應兒時性侵害之策略：

就像我後來是選擇不要告訴我爸媽，（在我成年早期）我媽她可能有一些感覺，她曾經問過我說：「有沒有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然後她就說：如果有要告訴她，她一定會跟我爸離婚（琳 I: 774-777）。

在經歷揭露兒時性侵害、與家人斷絕往來、獨自面對生活的考驗、從事社會改革工作後再與家人連結後，慧慧深切體認自己有受教育的機會與運用資源的能力，更能理解為人父母的艱辛，與父母能獲得資源之有限。慧慧道出「活

著真好」，和感謝有機會體會豐富人生之旅：

如果從性侵害這件事情來看，就會覺得說我爸爸媽媽好像沒有把我照顧好，因為他們太忙了。可是，再從另外一些角度來看，也可以發現說，我媽媽其實她已經盡力了，或者說，我爸爸他其實有給我很多對於生命的看法的那些資源（慧 III: 3017-3021）。

對慧慧而言，理解施虐者當時做出侵害行爲的脈絡，是左右其因應方式轉變之轉捩點。慧慧努力將性侵害行爲置入整個社會文化脈絡下解讀：

在要原諒我叔叔的那件事情上，那個路我走的比較遠。可是在原諒我爸爸上面是簡單的，因為我看到他對我的付出，或者是那個事情其實對我來說，更多的學習是人心的脆弱，還有極限在那裡（慧 I: 670-673）。

慧慧認爲社會文化價值也左右人們對兒時性侵害之責任歸屬。而在重視五倫、人際和諧、家族顏面及貞操觀的社會文化脈絡下所產生之壓力，絕非身歷其境者可以輕易擺脫的。慧慧認爲理解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後，協助重新建構因應兒時性侵害之意義：

其實性侵害這件事情的本質，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那個不尊重吧。然後那個不尊重的形式，並不是只有性侵害這件事情而已，在其他很多事情上，它其實也是同樣本質的事情的另類呈現，我覺得把這個觀念點出來，其實會讓有這樣子經驗的人，更清楚的脫離那個被害者的位置，或者說，不要去跟別人比較之類的（慧 III: 3158-3163）。

晶晶也有感而發：「不只是女人是個弱勢，這社會上的弱勢真的很多，其實這種創傷會造成蠻多的，就是只要有那個權力的不平等」（晶 I: 773-775）。縱然晶晶努力處理兒時性侵害之影響，但不斷受挫，甚至二度傷害。晶晶衷心盼望過去的努力可化爲未來的基石與助力：

如果一樣是逃不掉，倒不如現在把它給好好處理完，所以我再也不願意把黑盒子關起來關上了，妖魔鬼怪要出來，一次都出來吧（晶 III: 3794-3796）！

主題四、諮商歷程權能激發

在成年早期進入諮商，不少受訪者從敘說兒時性侵害經驗的過程中，獲得權能激發。曦曦舉一個隱喻，彰顯自己經歷一段諮商之後重新肯定以往為因應兒時性侵害所付出的努力，和賦予新意義，也使自我更為完整。曦曦以站在轉盤上來形容自己的因應變化：

雖然我人在轉盤上，可是它不管怎麼轉不管怎麼轉，它永遠讓我看的就是我的正面。我的背面永遠讓我在台下看不到，雖然那轉盤一直在轉，可是就是永遠就只有，不管要花，妳也知道那個轉盤在轉，妳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氣，才有辦法讓妳的身體隨時轉正，讓那個正面永遠面對著妳，其實那是很辛苦的（曦 II: 2901-2906）。

由於親子關係界限模糊，導致曦曦尋求心理諮商，以處理兒時性侵害所帶來的人際模糊與對自我價值的威脅。因自我覺察和自我接納，曦曦運用因應策略之自由度、和個人生命韌性也隨之增加：

現在我是允許讓它這樣子很自由的轉，我可以看到我的每一個面貌，所以那看到的是舒服的，因為在轉的同時，因為妳不用去對抗那個轉盤了，所以妳可能可以在那個轉盤上做一些很優雅的動作，所以我可以在台下看著很賞心悅目的看到我很多的面貌（曦 II: 2908-2912）。

琳琳進入諮商的目的不是處理兒時性侵害經驗，但卻在諮商過程中有新體會，不再為發生性侵害自責。琳琳說：

認知的告訴自己沒辦法，可是在情感面的難過還是會有啦……難過它就是發生了，我沒有抵抗能力啊，然後心疼自己要經歷這講到就會難過的過程我覺得那個諮商的過程對我來講很有幫助吧，就陪我去走過這樣子的過程（琳 III:

4271-4272)。

琳琳談及接受一年諮商後，對於兒時性侵害事件的責任歸因及工作態度有明顯轉變。琳琳說：

我覺得那轉折很大，就是從原本的很悶啊，然後覺得就想要逃離這個工作的感覺，到現在是覺得很順勢的，就是可以放手的感覺。從本來的很負向的情緒，到現在就是很正向（琳 III: 4284-4286）。

經由諮商過程不斷的回溯和述說，晶晶對兒時性侵害有新觀點，也將性侵害經驗納為生命史的重要章節。晶晶說：

第一次講就崩潰了，第二次講又崩潰了，第三次講愈來愈好，第四次講它就是一個事件，它只是一個事件（晶 I: 760-762）。

在成年早期，晶晶與慧慧欲處理兒時性侵害經驗而進入諮商。但慧慧認為從生活歷練或其他資源的處理效果，大過於諮商成效；而晶晶認為諮商的效益匪淺。

肆、討 論

一、重要研究發現

本研究受訪者皆遭遇家庭內近親猥褻，且僅有一位遭遇單一施虐者性侵害。施虐者運用權威及權力破壞身體界限，也粉碎人際間最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Futa, Hsu, & Hansen, 2001; van Dam, 2001）。兒時性侵害的發生反映了傳統文化中尊重權威的傾向（Futa et al., 2001），以及社會文化脈絡下因應兒時性侵害必須面對家族顏面、人際和諧、貞操觀影響之困難，更提醒需要關切當事人在成長歷程中，如何因應兒時性創傷所面臨之挑戰。

(一) 慣用之因應策略

受訪者面對兒時性侵害經驗之影響時，因應方式並非單一。受訪者慣於因應兒時性侵害影響之方式，以知命、運用閱讀治療、逃避人際親密、解離因應或避免受虐情境重現為主。也顯示在不同的誘發事件或壓力下，採取因應的方式也有所不同。這些慣用因應策略似乎與西方研究中常出現的逃避與解離因應一致（如，Morrow & Smith, 1995; Oaksford & Frude, 2003; Sigmon et al., 1996），但仍有其差異性，以下將一一討論。

受訪者在面對與兒時性侵害相關經驗時，慣用逃避因應，且大多呈現在人際信任或親密關係上。由於兒時性侵害事件大多發生在與施虐者同住時，受訪者甚難立即向他人揭露。也因施虐者多為家庭內近親，故受訪者在性侵害發生當時，必須面對權威、信任感破壞、本身認知能力之考驗，多採逃避或解離因應。本研究中，逃避因應策略之運用，似乎與性侵害程度或施虐者人數多寡無明顯相關。

即使成年早期，受訪者也是在重大生活事件或壓力迫使下，才選擇向家人揭露性創傷。可能也彰顯在重視家庭和諧、人際和諧、女性貞操和家族顏面的社會文化脈絡下，逃避因應是受訪者面臨困境時的選擇。所以，在成長歷程中，受訪者不是直接面對或處理兒時性侵害對人我界限之衝擊。導致受訪者關切的議題，易呈現在人際適應方面。而逃避因應策略，似乎也是面對兒時性創傷帶來的淹沒感之選擇（Merrill et al., 2001）。

由於受訪者正值成年期，在人際界限上，許多受訪者認為兒時性侵害的影響，以與異性的關係最為顯著。兒時遭遇性侵害經驗，易使人際適應困難（DiLillo, 2001），也使有些受訪者難以區辨性行為和性侵害行為。這樣的現象可能源自有些受訪者認為需要為性侵害過程中的性（興奮）反應負責，而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罪惡感、對親密關係和性行為混淆（Bell-Gadsby & Siegenberg, 1996）。另外，本研究也發現人際退縮與兒時性侵害相關，導致有些受訪者在成年期僅期望與異性維持親密，而逃避同性間的人際情誼。此發現補充以往研究僅著重探討異性親密關係，而忽略同性間人際親密之重要性。

解離在因應兒時性侵害影響上具有多重功能。在性侵害當下，可使受訪者與痛苦感受分開、創傷記憶零碎，且在壓力狀態藉由解離，也能協助面對抉擇。由於兒時性侵害之不可言喻，解離更可使當事人隔絕創傷記憶所引發的痛苦，也能使其轉而追求學業成就、努力尋求自我的補償和生存（Davis & Frawley, 1994）。所以，即使有些受訪者習於運用解離因應，仍可完成高學歷。顯示在實務工作上，對於解離的認定和治療，可提供診斷創傷後壓力疾患之依據，也應探討當事人如何詮釋解離在因應兒時性侵害、自我求生存上之功能，以協助當事人修正、選擇適切的因應方式，甚至擴展因應資源。

（二）影響因應策略轉換之因素

本研究辨識影響因應策略轉變的一些重要因素，在於受訪者成年早期面臨相當多挑戰，諸如正視兒時性創傷所造成的傷害、工作生涯的抉擇、重新建構兒時性侵害經驗或諮商歷程產生權能激發，都可能重新檢視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的方式。此發現可補充以往研究的研究僅說明成年期因應與兒童時期不同（如，Oaksford & Frude, 2003; Sigmon et al., 1996）。

受訪者對於成功因應兒時性侵害之詮釋，傾向接受發生兒時性侵害之事實，且以各種因應策略和資源，來面對任何與性創傷相關之經驗或所引發之漣漪效應，而非以靜態或終止的觀點來看因應後果。似乎與 Pargament (1997) 所提出之過程模式評估相仿。受訪者察覺對施虐者的複雜感受，特別是在成長歷程中，終因在成年早期對性侵害行為的理解，而尋求合適的方式因應，並重新建構成功因應之觀點。受訪者並非一直對施虐者的行為感到憤怒，在對因應兒時性侵害事件賦予意義的歷程中，會嘗試將性侵害事件放入社會文化脈絡下，尤其是人際和諧、家族顏面、貞操觀和體諒父母等觀點，來詮釋施虐者的行為動機，且與自己社會文化脈絡取得因應之平衡。這樣的情境解讀過程，不僅理解上一代的成長經歷（劉惠琴，2000；簡美華、管貴貞，2006），也反映因應兒時性侵害傷害之轉變。使受訪者可以將對施虐者（親人）的愛與對施虐行為的憤怒分開，也有機會理解如何在與施虐者（親人）的依附關係中，尋求因應性

侵害影響之意義。這個寬恕自己及施虐者的歷程，不管是在認知、辨識或重新建構上，皆非一蹴可幾（洪素珍、王玥好，2004）。因此，受訪者在成年早期對兒時性創傷經驗的重新建構，並不是逃避因應，而是因應壓力的情境脈絡所選用之策略。

有些受訪者也在因應兒時性侵害歷程中獲得正向信念和信心，和對生涯抉擇增權。因應歷程中，可能獲得正向意涵或自我價值的提升（Oaksford & Frude, 2003; Linley & Joseph, 2004）。但能以正向認知因應兒時性創傷者，並非在剎那間轉變其觀點，而是在不斷自我探索和生活歷練相互作用下，對身處之社會文化脈絡有更深體會，進而將自己的生命史中兒時性侵害事件賦予新的意義。顯示傳統的創傷與復原觀點，在心理衛生實務中可略加修正，尤其是增加理解在兒時性侵害發生後，當事人如何衡量有那些因應的方法、因應之目的，以及評量自身行為和社會體系間之適切性。而非急於評斷因應之立即效果，或期望當事人放棄現有的逃避因應策略。

相當多受訪者採用閱讀治療因應兒時性侵害之影響，但其因應結果不一。在資訊傳播無遠弗屆下，遭遇兒時性侵害者極可能透過資訊管道獲取訊息，如大眾心理學書籍、網路電子報、聊天室或論壇通訊（Ferrara, 2002）。已有研究顯示，參與自助組織者一旦尋求支持就充分運用資源，以達到生活適應，反而不是因為參加專業治療，而造成主觀的健康適應（Jonzon & Lindblad, 2006）。顯示在提供專業心理諮商之際，也應同時重視各式自助組織或團體的支持力量。

受訪者在面對兒時性侵害經驗之影響時所採的因應方式，以諮商歷程所產生的權能激發深具意義。敘說生命故事的力量不僅呈現在對受虐事件的重新建構上，也輝映在因應方式的彈性和多元性。顯然，兒時遭遇性侵害者開始接受心理諮商的契機與其發展任務攸關，如親密關係、親子界限或工作生涯抉擇（DiPalma, 1994）。也凸顯成年早期因應策略的運用，可能因生活壓力或重要發展任務，促使當事人拋棄慣用的因應方式。就像受訪者擔心性侵害對傳統女性貞操之影響，明顯反映在成人早期的親密關係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成年期

的認知成熟度或可運用的資源較多 (Whiffen & MacIntosh, 2005)，導致因應策略產生變化。若能增進因應資源的多元性與彈性，可能提升當事人之因應能力和適應。

二、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僅探討女性兒時性創傷經驗，無法得知遭遇兒時性侵害男性之因應策略是否差異，同時也限制了推論性。加上遭遇兒時性侵害的女性人數無法得估，和考量研究倫理僅邀請自行參與的受訪者，導致所邀請者大多屬於能以流利口語表達其經驗者，無法邀請有困難或不願意以口語表達創傷經驗者。也因回溯性研究在探討因應策略變化時，可能因當事人傾向記得目前的因應策略，而較難獲得長時期因應策略之豐碩資訊 (Oaksford & Frude, 2003)。此外，即使參與諮商也是因應策略，在大多數受訪者都曾參與諮商下，諮商效果或許也影響因應策略之轉變。

三、影響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探討受訪者在成長歷程中如何因應性創傷之影響，發現慣用之因應策略，包括知命、運用閱讀治療、逃避人際親密、解離因應或避免受虐情境重現。而常見的人際界限議題，也傾向以逃避策略因應之。但慣用的因應策略，不一定帶來正向效果。不少受訪者藉由閱讀大眾心理學書籍做為因應策略，且深信之。這些因應策略似乎與西方的文獻一致，但受訪者對於因應效果之詮釋似乎受到社會文化因素之影響，如家庭顏面、人際和諧、女性貞操和體會父母的處境等，值得未來從事跨文化研究之參考。心理衛生工作者需瞭解與評量當事人運用這些因應策略之時機與效果，以提供必要之資源或協助。

此外，成年早期所面臨的生涯選擇、親密關係的建立和維持等，都透露受訪者面對這些發展任務的壓力，甚至是因應兒時性侵害的策略也必須有所不同。這些研究發現，可協助心理衛生工作者對受到傳統人際和諧、家庭觀念、

家族顏面或貞操觀影響的當事人，更深入瞭解因應兒時性侵害之策略及其效果，以及奠定未來發展服務方案之參考。即使目前的諮商模式及諮商師之訓練養成過程，傾向以西方的諮商理論基礎為準，也致使不少受訪者描述生命史時出現西方諮商或自助心理學字眼，如內在小孩、復原、自我等。或許在諮商與研究中，需更謹慎評量這些西方觀點對當事人詮釋兒時性侵害之影響、因應成功之意涵為何。

建議實務工作應將社會文化脈絡之影響，如重視人際和諧、家庭觀念、家族觀、女性貞節觀等，納入實務工作評量，以瞭解當事人在因應歷程中所採用的因應策略及其功能，尤其因應策略在重新建構兒時性侵害經驗，和諮商歷程產生權能激發之效益。此外，未來應從事有關揭露兒時性創傷與親密關係議題之探討，以及更多縱貫性研究，深入探究因應策略之轉變與敘說生命故事的力量，以奠定研究之根基。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簡美華，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e-mail: crmmhc@ccu.edu.tw，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05)2720411 轉 36310。

收件日期：2007 年 2 月 7 日

複審日期：2007 年 4 月 17 日

通過日期：2007 年 5 月 31 日

參考文獻

-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7)。95 年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被害人數統計。2007 年 4 月 19 日，取自：<http://dspc.moi.gov.tw/public/Data/74415451471.xls>。
- 內政部警政署 (無日期)。95 年 1-12 月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數。2007 年 4 月 19 日，取自：<http://dspc.moi.gov.tw/public/Data/74415455371.xls>。
- 吳麗琴 (2003)。性侵害受害者之復原力探討與建構。輔導季刊，39，57-63。
- 李開敏 (2003)。受害兒少的創傷與輔導。月旦法學，96，54-74。
- 洪素珍、王玥好 (2004)。童年性創傷婦女處理原諒議題之歷程初探。台灣性學學刊，10 (1)，35-52。
- 范幸玲 (2004)。河流與陪伴者互動的故事——一位諮商師的反思歷程。中華輔導學報，18，203-240。
- 陳若璋 (2000)。兒少年性侵害—全方位防治與輔導手冊。台北：張老師文化。
- 陳若璋 (2005)。狼人現形：遠離性騷擾與性暴力。台北：性林文化。
- 葉貞屏 (2002)。性受虐兒童之復原力初探。初等教育學刊，12，289-299。
- 廖秀敏 (2002)。性侵害個案復原力技巧之運用。諮商與輔導，203，22-24。
- 劉惠琴 (2000)。青少年在母女關係中的個體化模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2，53-91。
- 簡美華、管貴貞 (2006)。變與不變之間：曾遭遇亂倫經驗的成年女性談母女關係。中華輔導學報，19，109-135。
- Aldwin, C. M. (1994).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Guilford.
- Batten, S. V., Follette, V. M., & Aban, I. B. (2001).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high-risk sexual behavior i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0(2), 101-120.

- Bell-Gadsby, C., & Siegenberg, A. (1996). *Reclaiming herstory: Ericksonian solution-focused therapy for sexual abuse*. New York: Brunner/Mazel.
- Chien, M. (2005). Deciding to disclose childhood sexual abuse: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women with their non-offending mother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15*(2), 19-39.
- Coffey, P., Leitenberg, H., Henning, K., Turner, T., & Bennett, R. T. (1996). The relation between methods of coping during adulthood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curren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 1090-1093.
- Davies, J. D., & Frawley, M. G. (1994). *Treating the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DiLillo, D. (2001).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among women reporting a history of child sexual abuse: Empirical finding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1*, 553-576.
- DiPalma, L. M. (1994). Patterns of cop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functioning incest survivors.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8*, 82-90.
- Ely, M. (1991).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ircles and circles*.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 Feiring, C., Taska, L., & Lewis, M. (1996). A process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adaptation to sexual abuse: The role of shame in defining stigmatizati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 762-782.
- Ferrara, F. F. (2002). *Childhood sexual abuse: Developmental effects across the lifespan*.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Filipas, H. H., & Ullman, S. E. (2006). Child sexual abuse, coping responses, self-blam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adult sexual re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1*, 652-672.
- Fleming, J., & Belanger, S. K. (2001). Trauma, grief, and surviving childhood sexual abuse

- in children. In R. A. Neimeyer (Ed.), *Meaning reconstruct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pp. 311-32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Frieze, I. H., & Bookwala, J. (1996). Coping with unusual stressors: Criminal victimization. In M. Zeidner & N. S. Endler (Eds.), *Handbook of coping: Theory, research, applications* (pp. 303-32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Futa, K. T., Hsu, E., & Hansen, D. (2001). Child sexual abuse in Asian American families: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revalence,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8*, 189-209.
- Futa, K. T., Nash, C. L., Hansen, D. J., & Garbin, C. P. (2003).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abuse: An analysis of coping mechanisms used for stressful childhood memories and current stressor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8*, 227-239.
- Himelein, M. J., & McElrath, J. V. (1996). Resilient child sexual abuse survivors: Cognitive coping and illusion.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18*, 567-587.
- Holahan, C. J., & Moos, R. H. (1994). Life stressors and mental health: Advances in conceptualizing stress resistance. In W. R. Arison & I. H. Gotlib (Eds.),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pp. 213-238). New York: Plenum.
-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ouston, B. K. (1987). Stress and coping. In C. R. Snyder & C. E. Ford (Eds.), *Coping with negative life events* (pp. 373-399). New York: Plenum.
- Johnson, D. M., Sheahan, T. C., & Chard, K. M. (2003). Personality disorders, coping strategie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women with historie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2*(2), 13-39.
- Jones, D. P. H. (1997). Editorial: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rategies as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1*, 207-209.
- Jonzon, E., & Lindblad, F. (2006). Risk factor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relation to subjective health among adult female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0, 127-143.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Leininger, M. (1994).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critiqu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 M. Morse (Ed.), *Criteria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p. 95-1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ley, P. A., & Joseph, S. (2004). Positive change following trauma and adversity: A review.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7, 11-21.

Long, P. J., & Jackson, J. L. (1993). Childhood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 adult adjustment of female sexual abuse victim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2), 23-39.

MacMillan, H. L., Fleming, J. E., Streiner, D. L., Lin, E., Boyle, M. H., Jamieson, E., et al. (2001). Childhood abuse and lifetime psychopathology in a community sampl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8, 1878-1883.

McMillen, J. C. (1999). Better for it: How people benefit from adversity. *Social Work*, 44, 455-468.

Merrill, L. L., Thomsen, C. J., Sinclair, B. B., Gold, S. R., & Milner, J. S. (2001). Predicting the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on women: The role of abuse severity, parental support, and cop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9, 992-1006.

Monat, A., & Lazarus, R. S. (1991). Introduction to stress and coping- some current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A. Monat & R. S. Lazarus (Eds.), *Stress and coping: An anthology* (pp. 1-1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rrow, S. L., & Smith, M. L. (1995). Constructions of survival and coping by women who have survived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2, 24-33.

Oaksford, K., & Frude, N. (2003). The process of coping following child sexual abuse: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2(2), 41-72.

Oddone-Paolucci, E., Genuis, M. L., & Violato, C. (2001). A meta-analysis of the

- published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5, 17-36.
- Pargament, K. I. (1997).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coping: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Padgett, D. K. (1998).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rewar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errott, K., Morris, E., Martin, J., & Romans, S. (1998). Cognitive coping styles of women sexually abused in childhood: A qualitative stud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2, 1135-1149.
- Rosenthal, M. Z., Hall, M. L. R., Palm, K., Batten, S. V., & Follette, V. M. (2005). Chronic avoidance helps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verit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4(4), 25-41.
- Runtz, M. G., & Schallow, J. R. (1997).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rategies as mediators of adult adjustment followi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1, 211-226.
- Russell, D. E. H. (1986). *The secret trauma: Incest in the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 Runyan, W. M. (1982).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piro, D. L., & Levendosky, A. A. (1999).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 and coping in psych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3, 1175-1191.
- Sigmon, S. T., Greene, M. P., Rohan, K. J., & Nichols, J. E. (1996). Coping and adjustment in male and female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5(3), 57-75.

- Steel, J., Sanna, L., Hammond, B., Whipple, J., & Cross, H. (2004). Psychological sequela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buse-related characteristics, coping strategies,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8*, 785-801.
- Taylor, S., & Bogdan, R. (1998).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book and resource*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Thompson, K. M., Crosby, R. D., Wonderlich, S. A., Mitchell, J. E., Redlin, J., Demuth, G., et al. (2003). Psychopathology and sexual trauma in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 35-38.
- Tierney, W. G. (2000). Undaunted courage: Life 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37-55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josovold, D., & Sun, H. F. (2002). Understanding conflict avoidance: Relationship, motivations,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13*, 142-164.
- Tremblay, C., Hebert, M., & Piche, C. (1999). Coping strategies and social support as mediators of consequences in child sexual abuse victim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3*, 929-945.
- Turell, S. C., & Armsworth, M. W. (2003). A log-linear analysis of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self-mutilation behaviors of women with histori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9*, 487-512.
- van Dam, C. (2001). *Identifying child molesters: Preventing child sexual abuse by recognizing the patterns of the offenders*. Binghamton, NY: Haworth Press.
- van Manen, M. (1990).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ang, Y. (2004). *A feminist qualitative stud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survivors in Taiwan: Coping in cultural contex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i-Columbia, Missouri.

Whiffen, V. E., & MacIntosh, H. B. (2005). Mediators of the link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emotional distress.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6, 24-39.

Coping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Mei-hua Chie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SA) often adopt avoidanc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impact of CSA.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ir coping strategies change over time. The purpose of this qualitative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CSA survivors to deal with the long-term sequelae of CSA and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changes in coping strategies. A life-history design was use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from fiv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recrui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All interviews were audio-taped and transcribed. A line-by-line approach has used to develop themes from the transcrip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ategies adopted to cope with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SA include a variety of factors as optimism, bibliotherapy, avoidance of interpersonal intimacy, dissociation, and avoidance of flashbacks. During young adulthood, participants tended to change coping strategies as a result of facing the CSA trauma, changing careers, reframing the CSA experience, and developing a sense of empowerment from counseling experiences. Limitations of the present study,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oping strategies, Taiwanese women.